



粗粮细作办食堂

1975年,我在南郊区小店公社红寺村当知青时,在知青食堂做司务长。粗粮多细粮少,副食差,油水少,做起饭来单调,知青对伙食颇有微词。冥思苦想,无米之炊终究难做。当时,知青经济收入也低,一年分红一次,大多能分100多元,这在知青里还算不错的。再说,肉蛋、白面大米,有钱也买不到啊,只能想办法粗粮细做。

红面在食堂上是最难做的,我们就请求生产队调剂一下,少分些高粱,方便食堂做饭。队长也非常照顾知青,社员也理解,知青可多分玉米,少分高粱,这样也减轻了些食堂做饭的难度。知青早晚是小米稀饭和馒头、玉米面窝窝,中午有面条、馒头、窝窝。会过日子的知青,中午吃半斤面条、一个窝窝,晚上就可吃一个馍馍、一个窝窝。有的知青前半月吃细粮多了,后半月还得借细粮票过日子。两个月下来,知青吃窝头不胜其烦。我们商量着早晚能否做些老乡常吃的“煮疙瘩”,以调剂单调的伙食。

煮疙瘩就是把玉米面放入大面盆,倒入开水,用木棒把水和面搅到一块,温度稍降低,就下手和。和好面后用双手拍成饼状,煮到稀饭锅里,一个饼有半两。新玉米面微微发甜,口感不错,大家感觉挺好,只是有人提出,一个煮疙瘩半两,怎么看也不够。我们解释,在做煮疙瘩时,面化在了汤里,这才释怀。从此,早晨晚上就改成稀饭煮疙瘩加馒头、窝窝了。

早晚饭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午饭还是想给大家变个花样,我们就想到了做包皮面,不用增加成本,粗粮细做,改善一下大家的口味。

包皮面是用一半白面、一半红面制作。我们也没经验,用秤称上红面白面各2公斤,分别和好,再分成两份,用白面包住红面,擀开切成面条。没想到,白面是冷水和面,红面是开水和面,同等分量的面,红面的体积竟比白面大近一倍,这让我们都感觉是否看错了秤,有的知青看到后,免不了又是一番解释。

那天,大家下地回来后,听说吃包皮面很高兴,还没开售饭窗口,就排成了长队,那天饭做得比平时还稍多点,但还是不够。我们又加做了一些,还专门烹了一些醋调和,面吃着爽口,还用了一半的粗粮票,大家很开心。

后来我们就力所能及地给大家调剂改善伙食,还尝试着做玉米面发糕,秋天红薯下来就蒸红薯,白面也变个花样,做点刀削面、包子之类的。在艰苦的环境中,吃法上有所变化,大家就容易感到满足,我们也感到自己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乡土记忆

陈亮

二月二炒“蛇蚤”

在我的记忆之中,每到了农历二月二,老人们都要从粮仓里分别舀一碗玉米粒和一碗黄豆来为孩子们炒爆米花和炒爆豆吃,而我的母亲却遵循老一辈人流传下来的风俗习惯,管炒爆米花叫炒“蛇蚤”。之所以叫炒“蛇蚤”,是因为过去的人们生活贫穷,不仅缺少吃食,就连换洗的衣服也很有限,衣服穿得久了,就容易滋生虱子和蛇蚤。

那时候人们物质匮乏,过年时准备的年货可不像现今这么丰盛,刚刚过罢正月,我们这些小屁孩就盼望着能吃上一顿喷香酥脆的爆米花。

每年赶在农历二月二这天,我们这些娃娃们头天晚上就催促着大人张罗炒黄豆和玉米了。平日里捉到了虱子和蛇蚤后,都习惯用大拇指甲狠狠一挤。而炒黄豆和玉米那“毕毕剥剥”的声音,正如平日里人们挤虱子和蛇蚤发出的声音一样使人解恨。只是玉米在炒的过程容易“爆花”,声音特别大;黄豆相对来说声音较小。于是,家乡人就把黄豆视为虱子,把玉米视为蛇蚤。每到农历二月二的头天晚上,一大家人就点着煤油灯,聚集在厨房里炒“蛇蚤”了。

每年都是父亲烧火,母亲站在灶台边炒,我和妹妹争抢着拉风箱。

炒的过程全家人还要边炒嘴里边念叨。当我和妹妹、父亲发问:“你炒啥哩?”母亲就会乐呵呵地回应:“我炒虱子蛇蚤哩!”“炒死没?”“炒死啦。”随着锅内黄豆和玉米发出的毕剥声越频繁越清脆,我们的声音也随之越来越响亮。

每每此刻,我和妹妹可高兴了,一会儿帮母亲翻锅铲,一会儿又去帮父亲拉风箱。这时母亲是最忙碌的,手里的锅铲不停地在锅内翻搅,嘴里还要不停回应,生怕一不小心炒糊了。有时猛不防锅内的玉米一连串爆发,伴随着“啪啪啪”的声音,像是放鞭炮一样甚至蹦到锅外。

怕滚烫的爆米花会伤及人,母亲就赶紧抓起锅盖来抵挡。每炒到紧要关头,只见母亲就会一手握铲,一手执锅盖,半侧着身子,一探身一弓背,时而盖锅,时而翻搅,常常回应我们的话还没说完,就边朝锅内放盐边叮咛:“别拉风箱了,别拉风箱了,当心糊了。”时常连额头的汗也顾不上擦一把。

当满屋子氤氲着炒黄豆和爆米花的清香时,我和妹妹早已馋得直流口水了。每次母亲把炒熟的爆米花和黄豆刚刚铲出锅,我和妹妹就迫不及待地抓一把,烫得在两只手里来回倒腾,常常顾不得滚烫就开始大快朵颐起来。那炒熟的爆米花和黄豆儿嚼在嘴里既油又香,我们大把大把地朝嘴里塞。

见我们嚼得起劲,那馋样儿往往可馋坏了同院里的大伯,尽管他牙口不好,但他也不甘示弱,抓起一把炒熟的黄豆和爆米花用蒜罐捣碎来吃。他抿着嘴巴慢慢咀嚼,猛不防一张嘴,那捣碎的干面面就会“呼”地一下喷出嘴来,逗得我们这些晚辈想笑却不敢笑出声来。

难忘时刻

母亲的烧火棍

刘贵锋

与朋友聊天,不知怎的说起小时候挨大人打的事来。要说起来,孩子挨大人的打,是常见的事,不算稀奇。我不免想起儿时被母亲拿着烧火棍责打的事来。

小时候,不听母亲的话,偷了懒或者爬树掏鸟,不小心撕破了衣服,再或者嘴馋,干了偷桃摘李的事,母亲恨铁不成钢,总要拿烧火棍教训我一番,让我长记性。记忆中,家里的烧火棍除了烧火,另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惩戒。那年月,母亲总要一天到晚在地里忙,没有时间管我,只好在中午或者黄昏做饭的间隙里,忙里偷闲地教育我,而烧火棍正好是母亲手中之物,就临时充当了戒尺的作用。久而久之,母亲得心应手,于是一物两用。

有一年,我特别厌学,不愿再去学校念书,又不敢告诉父母,于是每到上学的时间,就背着书包佯装去学校,在野外晃悠到放学的时间再回家。没过多久,母亲便知道了。那一次,母亲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愤怒,举着烧火棍劈头盖脸地打下来。那时,我已有十一二岁,男孩子青春期那种强烈的叛逆心理占据了 my 思想,我第一次没有站着受母亲打,而是撒腿往门外跑,带着某种倔强和少许的快意。母亲提着烧得黑乎乎的烧火棍在后面紧追不舍。

家门前隔着墙有一块足球场大小的空地,是村子里打麦子和堆麦垛的场所,而墙的两头有门和麦场互通。我沿着墙跑,绕着转圈,这样母亲撵不上我,也抓

不住我。母亲一边撵我一边破口大骂,扬言要把我的皮从头上剥到脚底。后来,我灵机一动,在转弯处悄悄躲藏在一座麦垛的后面。母亲不知道我藏起来了,绕着墙继续撵我,找不到我的踪迹,怅然地四处张望,喊叫着我的名字,许久才慢慢地回家。我躲在暗处,暗自得意,看到母亲落寞的神情,心里却又隐隐地不忍。

母亲的烧火棍陪伴我度过了童年的时光。我非但没有辍学,还上了县里的高中,后来甚至还侥幸上了大学。母亲则一天天衰老,年轻时过度的劳累在她日渐消瘦的身体上逐一化作了病痛,先是腰椎间盘突出,接着是骨质增生,两条腿慢慢变形,圈成了O型。她浑身是病,行动都已不便,再不能举着烧火棍打我了。

我曾读到这样一则故事:汉朝一个叫韩伯俞的人,生性非常孝顺。韩伯俞的母亲极严厉,韩伯俞偶有过失,就要用拐杖打他,他总是毫无怨言地跪下受母亲的打。有一天,母亲又拿了拐杖打了韩伯俞,韩伯俞失声大哭起来。母亲很奇怪,问儿子,从前打你,你没有一次流泪的。今天打你,为什么哭起来了呢?韩伯俞说,从前母亲打我,我觉得很痛,知道母亲的身体很健康。今天打我,我感觉不到疼痛,说明母亲精力已衰。恐怕后来的日子不多,所以不觉悲伤地哭起来。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伯俞泣杖”,读完后好长时间,我总想着这件事,心里难过。我多么希望母亲还能像从前那样,时不时举起那根烧火棍……

岁月留痕

我曾是编外运动员

赵仕华

30多年前,我读小学的时候,学校连围墙都没有,操场上仅有一个水泥做的篮球架,如果说还有什么体育设施的话,也就是两个用水泥做的乒乓球桌,仅此而已。那个时候的体育课最多的就是整队集合,甚至连广播体操也没有教过。

读中学后,体育老师开始教我们做广播体操了,学校还举行了广播体操比赛,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上体育课是可以做广播体操的。

我记得在初三的时候,学校挑选了一批运动员进行集训,参加县里面的中学生运动会。在我的印象中,训练的选手都是跑步的,没有其他项目。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因为跑步是最简单的,不需要太多的器材。负责训练这些运动员的,都是学校的体育老师,其中还有一个是教过我的张老师。我从小个子就矮小,跑起步来步伐就比别人要小得多,所以成绩也不如别人好,自然进不了这样的训练队。

记得看着那些同学训练了两三天后,我也心痒痒的,便去找张老师,请求他带我一起训练。张老师担心我吃不了这个苦,同时也告诉我,就算我参加了训练,如果成绩上不去,也不能参加比赛。但我觉得都不重要,我需要的是去感受一下这训练的氛围,弥补一下小学的时候没有上体育课的遗憾。张老师禁不住我的软磨硬缠,便收下了我。

训练是在下午放学后,最初几天的训练,让我走路也变得困难,上下楼梯时腿在不停颤抖。并且很多时候,训练结束后,食堂的饭菜已所剩无几。我心里隐隐有几分后悔,不停地想着打退堂鼓。更重要的是我跑不过那些同学,每一次我都是垫底的。后来,我的身体

慢慢地适应了这种强度的训练,上下楼梯的时候也变得利索了。只不过,我依然是那个跑在最后的人。

现在已记不清楚训练究竟是什么时候结束了,只记得他们去参加比赛后,我曾经一个人在太平小学的跑道上跑了一圈又一圈,没有掌声,没有呐喊声,没有一个观众,直到累得不行。我在用这样一种方式纪念着这一段时光。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其实,在人生的跑道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没有观众的,没有鲜花和掌声,但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不停往前奔跑。

每当我遇到困难,我就会想起那一段经历,想起那些无数次在跑道上想要放弃,但最后坚持下来的时光。我能成为一个比较自律的人,现在想来,与那次训练有着莫大的关系。

